

本刊將在10月和12月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中，設立專題討論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的可能性和土地財政的改革，歡迎海內外作者投稿，尤為歡迎對進一步轉型或改革的制度性障礙進行分析。

——編者

## 知青寫知青史

在「知青學」領域形神各異的眾多研究視角中，徐友漁的〈上山下鄉對知青一代思想形成的影響〉（《二十一世紀》2013年4月號）獨將思辨聚焦於上山下鄉對知青內心世界和價值觀念的影響：農村貧窮落後的現實動搖了他們長久以來的革命信念，「今不如昔」的現實擊碎了他們對「萬惡舊社會」的一貫印象，思想禁錮時期的自由閱讀交流更是進一步重塑了他們的世界觀——似乎一切都在朝着與國家預期相悖的方向演進。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嚴格來說該文應屬「當代人寫當代史」的產物，但作者並沒有一味沉浸於憶述自己和其他同齡人的「苦難」，而是認為正是上山下鄉，使得知青這一特殊群體成長為「清醒的一代」，進而擔當起推動改革開放與阻遏「左傾」運動的社會責任。在作者那裏，那段難以磨滅的歷史折射出來的更多是一道時代洗禮與思想鑄煉的軌迹。誰說當代人不能寫當代史？

梁志 上海  
2013.4.30

#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 「代際群體」的「有限變革」

對於中共新領導層常委的執政風格的認知和探討並不是新的話題，但法國學者潘鳴嘯（Michel Bonnin）的〈「文革一代」上台執政：差異何在？〉（《二十一世紀》2013年4月號）一文卻有着全新的視角，即立足於新常委集體的身份特徵——「代際」去進行研究。作者將新領導層的「代際特徵」劃為「文革一代」和「社會主義一代」進行探討，進而分析出未來十年中國的國家發展方向——新領導層的變革意識將是「有限的變革」。

這樣的結論導致的問題隨之而來。在作者眼中，「文革一代」是毛澤東革命理想塑造的產物，但是毛理想的精髓「社會主義」的治世理念，在改革開放之後已經出現了背離且漸行漸遠，而「文革一代」嘗受了從封閉、窘迫、壓抑到開放、富裕、自由（相對而言）的轉變歷程。在這種情形下，所謂「文革一代」是否真正去實現毛的理想（或價值），其信念值得懷疑。而且，該文對於中共最高領導層的研究依然囿於國際漢學固有的模式化研究：立足於所謂的黨內派系去研究其中個

體的政治（或思想）意志。問題的癥結在於，今日中共的派系基本已經褪下了政治（或思想）意志的外衣，而是為了謀取個人的上升渠道。顯然，對於此二者，該文缺乏明確的闡釋和回應。

中共的發展歷程表明，偶然、突發、戲劇性的政治風暴必然引起巨大的人事和發展方向的變動，而這樣的風暴並不在可預測的軌道之內，這無疑降低了該文對於其所宣揚的理念的準確性。儘管如此，該文對於我們思考中國的未來走向抑或轉變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焦宗燁 西安  
2013.4.27

## 不要把中間力量簡單化

肖海艷的〈陳啟天的「新法家」與中國青年黨的國家主義〉（《二十一世紀》2013年4月號）一文，即從學理角度研究中國青年黨的一大成果。肖文更多地力圖還原歷史（主要還原作者心目中的歷史），從中國受侵略、政治無序、法治欠缺、軍事軟弱無力等多重背景，找尋陳啟天「新法家」及青年黨國家主義的由來，並着重從中國

近現代思想史的角度，對此做了較為公允的評斷。拋開肖文來看，學界對於中間力量的研究，有幾點要引起充分的重視：

一、「民主黨派」這一稱謂可能帶給研究者先入為主的誤判。長期受革命史觀的影響，對中間力量的解讀容易形成某些定勢。毛澤東把「民主」的標籤貼在中間力量的臉上，主要是示好、籠絡這些政治力量。我們不能輕易認為，以青年黨為代表的中間力量自始就是憲政的鼓吹者。恰恰相反，青年黨建黨之初自認為比國共兩黨更為革命。整個中國近代史中主張「民主」、「憲政」、「法治」的，基本都是弱勢政治力量在軍事鬥爭無果，或受挫，或處於劣勢時的權宜之計。

二、中間力量基本上以知識份子為主體。這一點既不同於以軍人為核心的國民黨，也不同於以農民為基礎的共產黨。而現在的研究者則都是知識份子。知識份子研究以知識份子為主體的青年黨等中間力量，容易激發共鳴，容易從書生的視角衡量品評他們。於是，對中間力量的研究，就容易從思想文化史、教育史等領域入手；而一旦這樣去解釋中間力量，就把歷史簡單化了。

三、學界對青年黨及中間力量的研究，更多是「小看了」這股政治力量。青年黨絕不單純只有思想、學術、教育、民主、反獨裁一面，而是有着如同國共兩黨般複雜的政治運作，其內部鬥爭絲毫不比它們遜色。僅僅看到青年黨的「思想史」價值是遠遠不夠的。目前學界對中間力量的研究，較少關注他們與底層民眾——農民和工人的關聯。這一缺失使得

對中間力量的所有研究，均少了些「地氣」。

李翔 廣州  
2013.5.3

## 飲鳩止渴的國家主義

近年來，中國快速發展的經濟奇跡，使得「中國模式」的討論蔚然成風，隨之而來的是各種有關國家主義的討論。高力克在〈極權的誘惑：民主與獨裁之爭中的國家主義〉（《二十一世紀》2013年4月號）一文，重提民國時期關於獨裁與民主的爭論。誠如作者所言，新獨裁派以國家富強為目的；而胡適、張奚若等自由派以現代文明的政治價值為民主辯護雖不乏洞見，卻難以撼動新獨裁派對國家富強的籲求。高文引發人們去思考自由民主的內在價值以及作為一種政治制度的力量所在，尤其是如何回應新式獨裁的如此訴求。筆者認為重新反思獨裁與民主之間的關係，對於尚在尋求良好政治秩序的中國而言意義甚大。

獨裁論若是指向統一主權的絕對性形象，或能符合現代國家本身的生成邏輯，但若是直接意指國家構建的全部乃至建國後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沒有注意到國家主義不可避免地以權力吞噬權利、以國家吞噬社會所帶來的嚴重後果，其急功近利無異於飲鳩止渴。若幻想以獨裁建國後再施以限制，顯然忽視了權力本身的自我生產性與自我膨脹性。若以長治久安計，以自由民主為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必須的。

陳華文 北京  
2013.4.30

## 探曠索隱 管中窺豹

就中國大陸大多數五十多歲的城市居民來說，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活是他們人生中難以忘懷的蹉跎歲月，是他們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基礎。丁東的〈知青經歷和一代人的價值取向〉（《二十一世紀》2013年4月號）一文對那段經歷以及其對一代人的影響進行分析。

丁文共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對近期國內外關於新一屆中共核心領導層曾經的知青經歷對其執政所造成的影響的綜述。雖然絕大部分是引述，但從中也反映出作者的觀點。文章的重點和精華在最後兩部分，雖然只佔全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卻是作者思考的結晶。語言是思想的外化，而從政的起始階段無疑會對未來從政之路奠定重要的基礎，作者抓住「語言」和「初始從政經驗」兩方面，探討了知青經歷對當政者正面和負面的影響。

丁文可謂管中窺豹，從中可見一斑。但也只是「一斑」而已，離「全豹」畢竟還差得很遠。從文章篇幅、結構也可以看出，三分之二的內容是引述和背景資料，真正的思考和分析只佔三分之一左右，且只有兩點。而這兩點中，能夠說明問題、具有實際意義的或許只是「關於知青的初始從政經驗」這部分內容。以此區區兩點而論「一代人的價值取向」，確乎是作者的一廂情願了。

許波 北京  
2013.4.19